

中国乡村转型的尺度重构视角： “权力—资本—社会”三维解析 框架

A Rescaling Perspective on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ower—Capital—Society"

宋祖萱 陆希刚

SONG Zuxuan, LU Xigang

关键词 尺度重构；乡村转型；权力—资本—社会

Keywords: rescal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power—capital—society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361/j.upf.202601012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6)01-0089-07

作者简介

宋祖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songzuxuan0522@163.com

陆希刚，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通信作者，paulu@vip.163.com

提 要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国乡村正经历着深刻的功能转型，亟须超越传统叙事的新理论视角。发轫于西方全球化背景下的“尺度重构”理论，尽管在解释跨尺度要素流动与关系动态重组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但其市场经济渊源与宏观尺度偏向使其在诠释中国乡村功能转型时，不仅面临制度语境导致的理论适应性挑战，更要解决尺度变换导致的研究可操作性挑战。为此，尝试探讨该理论在中国乡村功能转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和议题，并将其纳入“权力—资本—社会”三重维度的中国乡村地域尺度重构解析框架，旨在揭示乡村转型中外部力量与内生结构如何通过尺度博弈与互嵌共同塑造乡村空间。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urbanization, rural China is undergoing profound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s that urgently requires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beyond traditional narrativ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rescaling theory, which was developed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globaliz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its value and limit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in China. While this theory is effective in explaining the dynamic reorganization of cross-scale power, capital, and social relations, its market-economy origins and macro-descriptive tendencies pose challenges when applied to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s in rural China. Specifically, it faces theoretical adaptability challenges due to institutional contexts, as well as operational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scale shifts. To this en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key challenges faced by this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It integrates the theory into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rescaling in rural China based on the triple dimensions of "power—capital—society". The framework aims to reveal how external forces and endogenous structures collectively shape rural spaces through scale gaming and embeddedness in the course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城市化与全球化双重驱动的中国乡村正经历着空前的空间与社会转型^[1]，其复杂性远非传统的“城进村退”或“乡土消解”等线性叙事所能概括^[2]。乡村地域已从相对封闭的稳态结构转变为在多重力量作用下被不断“打开”并“重构”的开放场域^[3]。权力、资本、信息、人口等要素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速度跨尺度流动^[4]，催生了乡村功能形态的“异质异构”与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5]，急需新的理论视角予以解读。发轫于西方的“尺度重构”理论，以其对空间政治经济属性的敏锐洞察^[6]，超越了静态行政空间边界，将空间视为由社会经济的空间关系所建构的动态场域^[7]，为理解乡村转型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分析工具。

本文旨在推动尺度重构理论与中国乡村研究的对话，探讨中西方语境与理论本源的结构差异以及尺度变换所导致的理论适应性与研究操作性挑战，以及如何通过理论方法调适与视角拓展来应对这些挑战。为此，本文首先系统梳理尺度重构理论的内涵、价值及其局限，辨析尺度重构与乡村空间多层意蕴的内在关联，论证理论对于乡村研究的适用性；进而剖析该理论因制度背景、尺度变换所导致的理论与方法挑战，并提出相关议题；最终，尝试将研究议题整合到“权力—资本—社会”三重维度的中国乡村地域尺度重构解析框架。在中国乡村转型研究中引入并发展尺度重构视角，不仅为复杂机理解读提供新路径，更是对全球化理论进行本土化检验与修正的有益尝试。

1 尺度重构研究回顾

1.1 尺度重构的内涵

“尺度重构”指支配关系（如权力、资本、社会影响力等）尺度跃迁所导致的空间尺度的解构与重建，旨在通过空间尺度的生产和再生产推动社会关系建构和再建构^[8]，引导关键支配关系的优化配置^[9]。如在全球化的空间关系建构中，通过尺度权限“再分配”构建新的尺度层级（如都市圈、城市群），将生产要素“附着”于特定地理空间以最大化利用。可见，尺度重构的本质在于以尺度视角探讨关系建构在空间中的运作方式与

逻辑。

在尺度重构研究的多重空间维度中，以权力、资本和社会关系最受关注，如Brenner^[10]将地域划分为权力地域、资本地域和社会地域。维度差异反映了对空间内涵认知的不同视角：权力视角将空间视为权力获得合法性的地域范围，资本视角下的空间是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场域，而社会关系视角强调空间中建构的感知、根植性和认同感。相对而言，空间其他维度诸如自然环境的作用尺度具有长期稳定性，并不会发生“尺度涨缩”。因此可以认为，权力、资本、社会是最为活跃的三重维度，主导了空间尺度重构的动态。

1.2 尺度重构的思想价值与局限性

作为空间生产理论在尺度范畴上的延伸，“尺度重构”关注空间尺度的多重维度属性及其在全球到地方尺度上的动态重组与建构，对于理解空间变化的内在逻辑极具思想价值。首先，强调尺度的社会建构性与政治性。尺度并不是一个先赋实体，而是一个不断被政治行动和空间社会关系重构的制度舞台。其次，将尺度视为动态关系场域。要素流动和关系网络重新解构了传统固定地理边界，形成了具有渗透性的“关系性场域”。最后，初步涉及了权力—资本—社会的尺度匹配。由于尺度重构既是权力管辖的治理工具，又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弹性需求，也成为社会博弈的竞技场，故研究强调权力、资本与社会力量如何通过动态匹配重塑空间格局，使之成为多维尺度空间的拼贴体。

必须承认，尺度重构理论的局限性同样明显。首先，该理论始终与市场主导的全球化高度绑定，关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资本、权力与制度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过程，导致理论过度强调全球性力量的主导作用，忽视了地方、区域内生性动力等非全球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差异显著的制度背景。其次，研究多集中于全球、国家和区域等大尺度，致使理论体系呈现出“自上而下”宏大叙事倾向，抽象程度高而实证基础薄弱。宏观叙事偏向导致尺度重构理论在微观尺度层面缺乏足够的解释灵敏度与实操性，难以有效应用于乡村、社区等更小

地域单元的实证研究，因而限制了其对多样化地理过程的分析能力。

2 尺度重构在乡村领域的适用性

2.1 全球化新诠释：星球城市化与全球乡村理论

针对尺度重构关注的全球城市中心主义或全球化力量支配说，Brenner的星球城市化理论和Woods的全球乡村理论分别从城市化和乡村视角进行了批判性修正，为尺度重构向乡村领域的延伸提供了理论支撑。

Brenner等的“星球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倡导跨尺度、去等级化的空间重构逻辑^[11]，认为通过“延伸城市化”（extended urbanization）或扁平化的传导机制，边缘地区、偏远村落等较低层级空间单元可以绕开上级空间单元直接嵌入全球网络^[12]，形成“远程耦合”^[13]。与传统的集聚式、层级化的城市化模式相比，其空间链接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传统上受制于地理距离与制度层级的“权限壁垒”被部分消解，某些低层级区域不再严格遵循阶梯式递进的等级秩序而直接实现“跨尺度跳跃”。总的来说，“星球城市化”的观点揭示了一个本质性趋势：在空间集聚效应持续受到关注的同时，一种扁平化力量正在同步形成，这种力量不断弱化并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层级的束缚，推动各层级空间走向更为平等的相对关系，从而为乡村等低层级空间的转型创造了新的可能。

Woods基于空间关联性和地方性提出的“全球乡村”概念^[14]，通过乡村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结构性位置来阐释乡村的本质、乡村意义的再生产，分析乡村地方行动者参与全球网络响应的过程^[15]，强调乡村地方的多元性和差异性^[16]。要言之，全球化绝非全球力量的单方支配，而是全球性力量和地域性响应共同在混杂的乡村性特征中创造出新的空间实践。

2.2 乡村空间与尺度内涵

受空间生产理论“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启发，相关研究^[17]认为乡村空间同样具有三层意蕴，即物质的、想象的和实

实践的乡村空间。物质的乡村空间指基于诸如行政地位、人口、建成环境等客观属性鉴别的乡村地域；想象的乡村空间指通过特定群体的共同想象作为“修辞手段”的乡村^[18]，诸如城市居民等他者意象中“田园牧歌”意象；实践的乡村空间指通过实践将真实景象与抽象概念相结合，以表达居民日常生活的乡村^[19]。对于乡村居民而言，“田园牧歌”的他者意象可能是“一地鸡毛”的生存状态。

与此相应，尺度亦分为现实尺度、分析尺度和实践尺度三个层面^[20]。现实尺度基于尺度的本体论含义，作为地理现象固有的性质，客观真实地存在于实体单元、空间格局和地理过程之中；分析尺度基于尺度的认识论含义，把尺度作为观察世界和塑造认知的视角，涉及主体意识的重塑，具有主观的、表征的建构属性^[21]，被认为是在特定空间构建的社会关系^[22]；实践尺度则是基于对尺度效用的方法论运用，利用尺度的相对性争夺资源和权力，通过将尺度作为工具进行转换从而使事态向有利于主体的方向发展。

2.3 乡村功能转型与尺度重构

在政权建设与城市化的双重影响下，中国乡村近百余年间的变化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急剧的功能转型进而导致了行政组织、经济效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尺度重构。中国传统乡村普遍形成了以宗族、乡约为纽带的乡里组织，有效维系了基层社会的秩序与治理；同时，依托周期性集市和区域市场网络，实现了资源互通与经济循环。近现代以来乡村地域不断从半自治向行政化转型，国家政权建设持续向县级以下延伸，旨在充分动员社会力量、汲取社会资源。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城市经济外溢效应引发村庄的功能转型^[23]，具有产业、教育、医疗、旅游等资源和功能的村落转型升级为具有辐射作用的中心村或集镇，通过市场、资源、信息、道路等与其他村落产生“强连接”，形成“集镇—中心村—一般村”的规模等级结构^[24]。村庄内部均衡分散的“小聚居”开始瓦解^[25]，空间布局发生重构，并深刻影响了乡村地区的行政、经济和社会组织。

在行政组织方面，为监督引导都市区乡村发展，部分大城市政府将乡村聚

落纳入城市社区的管理体系，在“村改居”的要求下建立管委会、居委会等组织机构；为提高土地投入产出效率，实现规模效应，通过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进行整村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分配^[26]。在经济效益方面，为了增加产业用地的空间供给，村集体不仅要使用村内废弃地、流转承包地、整理土地指标，还要遵循“收益内部化、成本外部化”的逻辑核心，通过开放的经济网络实现产业空间的外延和土地资源的一次性扩容^[27]。在社会生活方面，乡村人口和社会关系的地理外溢重构了村庄社会边界，同时乡村居民入城、外来人口进入以及城市居民旅居均导致了都市区乡村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复杂化，另外村民生活消费对集镇和中心村依赖性的加强必然导致村民生活范围及社会感知的重构^[28]。

2.4 尺度重构在乡村研究中的适用性

尺度重构理论对乡村地域的解释力与适用性体现为尺度的三个重要特征，即尺度社会网络性、尺度行动者主体性、尺度政治过程性。首先，尺度的社会网络性从关系属性的视角强调了跨越尺度边界且处于动态演变过程中的社会空间联系，而城乡交互正是通过多元、开放、跨地域、多层级的要素网络化过程增强城乡社会经济生态空间联系。其次，尺度行动者主体性从博弈论的视角表达了行动者以场所为基础依靠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拓展更广域的尺度空间，而乡村权属的复杂性必然会导致多元行动主体通过网络化的组织进行争夺和博弈，自下而上包括村民、村庄精英、村委会、外部投资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等利益主体，在异质网络的复杂关系中形成动态社会生产。最后，尺度政治过程性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描摹了社会空间关系重塑过程中的社会建构和政治博弈，而乡村具有多级制度空间，在行政尺度方面由多层次的集镇、村庄及其所管辖的区域组合而成^[29]，为政治行动和空间社会关系的重构提供了完美的制度舞台。

3 尺度重构在中国乡村语境下的结构性差异

3.1 全球化新诠释在中国的现实表达

全球化新诠释在中国语境下体现为

乡村空间逻辑的根本性重构。扁平化的城市化进程正冲击着传统的、以垂直隶属为特征的“树状”层级结构，乡村日益嵌入由资本、信息与物流构成的扁平化全球经济网络之中，实现了与远端区域的直接、“跳跃式”链接，这实质上导致了经济空间与行政空间的结构性脱钩——行政空间依然维持着等级化的支配体系，而经济网络的运作则呈现出更为去中心化、跨尺度的复杂形态。最终，中国的乡村转型正是在经济流动性与行政规范性的双重现代化力量交织下展开，在城市化趋势日益扁平化的背景下呈现出全球与地方互动的复杂图景。

3.2 中西方语境的结构性差异

在中国城市化与乡村转型中，国家主导的“政府力”在市场机制与社会结构中的深度嵌入与绝对支配，从而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空间生产范式。首先，在行政体制层面，中国的市在本质上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地方自治体”(municipality)，而更接近于一种“区域行政体政府”。它并非纯粹的地方利益代表，而是具有强烈行政等级色彩的辖县政区单元。其次，在市场力量层面，中国的市场化是在政府强力主导下的可控进程。资本与空间关联的关键枢纽是政府而非市场本身，所有投资与招商引资行为均被纳入行政规划的轨道。这使得市场力并非独立作用，而是成为政府力实现空间生产目标的工具。最后，在社会参与层面，中国的乡村社会表现出显著的“依附性”。尽管存在“村民自治”的制度形式，但由于缺乏财政自主权，村民在本质上更多是公共服务的“受益者”而非“决策者”。

上述特征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聚落组织与行政组织的“二合一”。在这一体制下，行政体系的层级支配关系直接定义了聚落间的关系，使后者被整合进一个严密的“树状”等级网络中，无法实现国家事务与地方事务的分离。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差异塑造了中国城市化与乡村转型中政府力空前强大、市场与社会力量均被统合其中的独特路径。

3.3 尺度重构在中国乡村转型研究中的

挑战

尺度重构理论为理解空间治理的动态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关系性视角，然而在中国乡村转型的具体语境中，其理论普适性面临两方面的突出挑战。

首先是源于制度背景差异的理论不适应性。西方尺度重构理论多建立在国家与资本相对分离、地方自治制度较为清晰的背景下，其逻辑起点在于国家为回应全球资本流动而主动调整治理层级。然而，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具有“政府力”深度主导与渗透的特征，市场与社会力量均被高度整合进行政体系之中。这使得中国的尺度重构往往表现为国家在既有行政等级框架内，通过政策试验、项目制等方式进行的内部调适与再组织，而非简单的“国家—资本”二元互动。因此，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政府主导下多层次行政主体（省、市、县、乡镇）的策略性博弈与能动性时，常出现解释力不足的“不适应性”，难以充分捕捉中国语境下尺度政治的多维性与复杂性。

其次是分析尺度下沉带来的视角转换与操作难题。当分析尺度从宏观的国家战略层面下沉至地方具体的转型过程时，研究者必须从单一的国家或资本主导视角，转向关注多元主体——包括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资本方、基层社区乃至村民——之间的互动与博弈。然而，既有的理论框架缺乏有效工具来系统刻画这种多主体、多层次的动态过程。尤其是在中国乡村场域中，非正式但具有韧性的“乡土性”与社会关系网络，虽深刻影响着尺度重构的实践与效果，却因其边界模糊、组织形态非正式而难以被纳入以显性制度结构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如何构建能够同时容纳国家逻辑、资本动力与乡土社会内生性因素，并揭示其复杂互嵌机制的研究路径，成为当前研究亟待突破的方法论挑战。

3.4 中国乡村尺度重构的研究议题

中国乡村转型的本质是“制度—经济—社会”空间在多重尺度上通过动态博弈、相互塑造进行重构的过程。本文从三维空间的互构机制与尺度依存性的角度，提出如下研究议题，为理解中国乡村转型中尺度重构的复杂性、动态性与本土特性提供初步的研究纲领。

首先是三维空间的尺度化识别与重构过程。此议题旨在回应“分析尺度下沉”带来的操作难题，要求对三重维度在乡村场域的具体运作进行精细化的尺度解析。对于权力的尺度重构，研究需聚焦制度空间的生产：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政策与行政支配，如何通过多层级的“尺度下推”与策略性博弈，与自下而上的地方利益诉求、变通执行及协商共谋发生互动，从而引发制度规则、资源分配权与发展话语权的动态重组？对于资本的尺度重构，研究需剖析经济空间的重塑：外部资本以何种方式“组织沉降”并嵌入地方？其空间分布呈现何种规律？资本运作如何塑造并改变经济活动的空间尺度边界？对于社会的尺度重构，研究需捕捉社会空间的变迁：传统基于血缘、地缘的“乡土性”关系网络，在人口流动、市场渗透下发生了怎样的结构变迁、功能转化与意义重构？这种变迁在具体的空间布局与跨地方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具体体现？

其次是三维空间的互构机制与尺度互动。此议题旨在超越单一维度的分析，直面“制度背景差异”带来的理论整合需求，深入探究多维空间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核心问题包括：①三维空间如何相互影响？是单向的支配、双向的反馈与调适，还是更为复杂的网络化互嵌？例如，制度空间中正式规则的刚性规制与非正式规则的柔性调节，如何共同塑造并约束着经济空间的产业形态与社会空间的关系网络？反过来，经济空间中产业的升级与分化如何引发社会结构变迁（如新阶层出现、传统共同体松动）并反馈至制度空间（催生新的治理需求与政策调整）？社会网络中基于文化认同与信任的“地方性知识”又如何反作用于招商引资（经济空间）与政策执行效果（制度空间）？②三维尺度重构过程之间存在何种相互作用？权力、资本、社会的尺度博弈是同步、递进还是相互竞争？③不同发展阶段下，三维空间的关联模式与主导逻辑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最后是三维空间的主导性演变、适配逻辑与行动者策略。此议题旨在揭示乡村尺度重构的动态性与策略性本质，关注多重尺度间的张力及其化解机制。

核心问题包括：①在乡村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或政策周期中，制度、经济、社会三维空间的主导性（即相对重要性或支配力）如何发生演变？其背后涉及怎样的核心权力与关键资源在不同尺度上的重构过程？②乡村的健康转型有赖于三维空间形成某种适配性。那么，其内在的适配逻辑是什么？当隐性的、实际运作的社会关系与经济联系尺度，与显性的、法定的行政管辖发生尺度错位或尺度失配时，会产生何种治理困境或发展机遇？③面对这种错位或失配，多元行动者会采取怎样的策略性行动？他们是如何有意识地利用、创造或跨越某些尺度（例如，通过“项目打包”向上对接国家战略尺度，或借助社会网络横向连接市场资源），以突破既有尺度结构的限制，实现自身目标并从而推动乡村空间的实质性重构？

4 中国乡村地域尺度重构解析框架

本文将乡村置于城乡发展网络中，考察多元主体在乡村多功能转型中的行动、关系和影响以及乡村在内外力量构成的新旧网络互动中被建构与塑造的过程，通过“超地域边界”的空间关系解析乡村转型机制（图1）。乡村韧性发展的本质是通过连接更广泛的外部行动者网络来调动当地资产的发展潜力并满足当地需求^[30]，向内调动当地积极性的同时向外“推销”当地，获取非当地消费者的满意和上层决策者的认可。外部力量介入乡土社会的嵌入方式包括借助组织形式有效整合资源的结构性嵌入和借助交往沟通过程强调共享价值与信念的认知性嵌入两种类型^[31]。

4.1 权力争夺与乡村制度空间

制度空间是动态的、充满张力的规则或规范，它既是权力争夺的“战场”，又是塑造乡村发展路径的“框架”。权力的尺度重构主要讨论国家权力在不同尺度和国家空间中的运作问题，以及在一定社会权利结构下，乡村行为主体通过共同参与、谈判、协调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过程。权力争夺围绕制度空间的三个维度展开：从规则制定权的角度，谁

有权定义什么是“发展”以及合理合法的“发展模式”？从资源分配权的角度，谁来决定土地、资金、政策补贴等关键性资源如何分配？从话语权的角度，什么样的叙事和话语体系能够在乡村中成为主导？

权力的尺度节点自上而下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委会、村庄精英（图1）。有效的国家能力是善治的前提，政府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政权机构^[32]，在乡村建设场域拥有强大的话语权^[33]。中央政府是整个国家权力的代表，作为顶层设计者为乡村发展提供有效的战略推动力^[34]。地方政府是国家政策的解释者和执行者，将国家政策纳入适合当地资源条件的地方发展战略。村委会作为基层组织，是在政府和当地村庄之间建立联系的中介^[35]，同时兼有行政、经济和社会多重属性。村庄精英是在村民中具有威信的人，在村内事务的组织协调中具有关键的作用，国家通过承认乡村精英而使国家意志得到体现和贯彻，而乡村精英则通过进入国家体系获得合法性^[36]。

具体的尺度重构策略如下：村集体或地方政府采用项目制和荣誉称号等政策工具，将本地资源通过尺度上推与更高级别的国家战略、资本市场对接，将

乡村纳入更广阔的经济循环；国家政策通过尺度下推被层层传递至乡村基层，其执行过程必然与地方性知识、本土利益发生碰撞与协商；新行动者的介入，绕过部分传统行政层级，创建了新的、跨地域的网络化治理尺度，改变了原有的权力运行轨迹。将权力争夺与制度空间相结合，深刻揭示乡村振兴实践中错综复杂的权力利益关系，为理解中国乡村转型提供一个动态的、关系性的分析框架。

4.2 资本流动与乡村经济空间

资本作为最活跃的要素之一，在激活乡村资源、重塑产业形态的同时，也深刻地解构与重构着乡村传统的经济空间。市场经济下空间的逻辑从属于资本的逻辑，资本不断征服和占有空间的过程称为资本的尺度重构。

资本的尺度节点自下而上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市场（图1）。村内劳动力的有效组织即可为乡村提供巨大的生产力。农村土地确权分置改革将原本不可分割的承包权分离为承包权和可流转的经营权，以吸引资金进入农村地区^[37]。当乡村的发展条件基本完善且实现自主运营之后，会通过商品链、信息流和资本流动与更广阔的市场产生经济

联系。

具体的尺度重构策略如下：首先是地方尺度的生产，资本的流入改变了土地用途、劳动力雇佣模式和本地产业结构，在传统农业生产空间向集生产、加工、旅游、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转型的过程中，资本在新的空间范围内形成了固着的尺度；其次是区域尺度的网络连接与重组，资本流动将乡村与全球—地方生产网络、跨区域供应链、远程消费市场相连接，使乡村经济空间突破地理边界，成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经济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最后是国家战略尺度的对接与整合，资本往往是响应和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其流动过程体现了国家意志在地方层面的尺度下推与本地化实践。将资本流动与经济空间相结合，从尺度动态的视角剖析资本重塑乡村空间的多维复杂过程，助力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乡村发展新模式。

4.3 关系网络与乡村社会空间

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层变迁，传统的、基于血缘地缘的“差序格局”正在与现代化的、基于利益与契约的“合作格局”相互交织、碰撞与融合，构成了复杂的关系性社会空间。生产要素流动和城乡关系变迁导致的时空分离使得乡村社会关系摆脱了地域性支配，跨越了原有的在地化的空间边界，在更广泛的空间尺度上进行延伸和重组，即社会的尺度重构。

社会的尺度节点自下而上包括血缘、地缘、业缘、社会资本（图1）。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们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宗族间的世系关系形成了毗邻的地缘关系^[38]，费孝通先生将这种超越血缘关系的、以“礼制”来维系的等级社会结构定义为“差序格局”^[39]。血缘和地缘关系共同作用，形成了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而农业转型与为改善生计而进行的移民相结合，导致了新文化身份的出现，曾经植根于共同生计和身份认同的互助网络已被削弱，乡村的社会关系已从以亲属和地域为基础转向以工作和职业为基础。新职业和新产业的出现促进了多样化和技能发展，重建了以业缘为基础的生产组织网络^[40]。随着乡村日益由封闭走向开放，村民开始遵循更泛化的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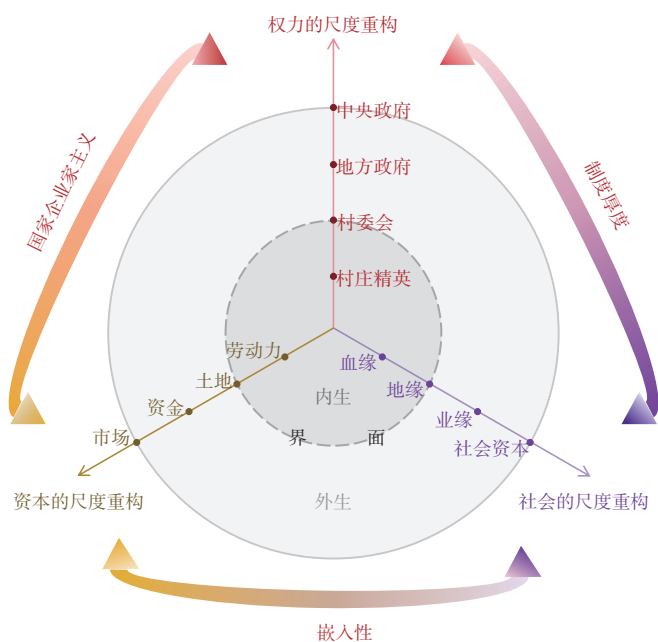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乡村地域尺度重构解析框架

Fig.1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rescaling in rural China

法律和社会核心道德组成的社会规范，随着信任关系由“地域性”向“脱域性”转变^[41]，现代社会呈现出等序结构。乡村社会资本是指嵌入乡村社会关系中、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的总和，是乡村共同体内的个人或组织通过长期交往达成的合作互利关系^[42]。

具体的尺度重构策略如下：首先是网络边界的伸缩与渗透，传统封闭的村落共同体边界被打破，外部关系不断嵌入，与内部关系网络发生连接，形成了“内外交织”的跨地方社会空间；其次是网络层级的跃迁与桥接，关键行动者（如新乡贤、村干部、致富能人）通过其个人的外部社会资本，成为连接村庄与更高尺度资源与政策的“桥接点”，实现了社会资本的尺度上推；最后是网络逻辑的叠加与转换，乡村社会互动中，人情、面子、信任等传统伦理逻辑与合同、契约、利益计算等市场逻辑并存，行动者需要根据情境在不同逻辑间切换，策略性地运用不同的关系网络。将关系网络与社会空间相结合，深刻理解乡村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关系”互动的复杂性，为解读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更具本土契合性的分析视角。

4.4 三重维度的相互作用关系

权力、资本、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关联。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一方面承认社会的独立性并为其提供法治保障，另一方面保持对社会的合理调节与干预，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在地性转换^[43]。本文引入“制度厚度”的概念以强调农村政权运作过程中内生社会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重要性。“制度厚度”指区域内正式和非正式的体制结构和能力的总和^[44]，当“国家与社会”的脉络转入“制度与生活”时，文化视角的引入强调了地方知识与地方价值，通过适应文化特性的治理实践打破国家社会关系的零和博弈^[45]。对于国家干预与资本逻辑的结合，“国家企业家主义”超越了新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的二分法，在政治理性与企业治理手段之间提供了辩证视角，旨在将竞争和企业管理融入政府运作，支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并促进创新^[46]。对于社会与经济的关系，本文引入经济社会学中“嵌入性”的概念^[47]，

其核心是将经济行为置于社会关系中，认为经济理性主义实际上会受到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网络的制约^[48]。

5 结语

中国乡村功能转型是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过程与社会空间实践。“尺度重构”理论以其对空间关系动态隐含本质的深刻洞察，成为理解中国乡村转型进程的新视角。将尺度重构理论应用于中国乡村研究面临两大核心挑战：一是西方“国家—资本”相对分离的理论预设难以解释中国政府深度主导、市场与社会力量被高度整合的政治经济结构；二是从宏观战略下沉到微观实践时，理论工具难以有效捕捉国家逻辑、资本动力与非正式“乡土性”社会网络之间复杂的互嵌机制与多元主体互动。为回应这些挑战并增强理论的本土解释力，本文聚焦“制度—经济—社会”三维空间的互构，提出三个递进议题：一是识别权力、资本、社会各自的尺度化重构过程；二是探讨三维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三是揭示三维空间主导性的动态演变、内在适配逻辑及行动者应对尺度错位的策略。尺度重构视角促使我们超越“传统—现代”“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将中国乡村转型理解为一个多尺度力量相互作用、多重逻辑并存共生的关系性进程。未来还需扎根于中国丰富多元的乡村案例，在鲜活的发展实践中揭示尺度重构的动态过程与复杂机理。

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与建议。

参考文献

[1] 张凯, 段德罡, 王瑾. 善治目标下乡村“建设—治理—运营”协同的主体逻辑与关联模式: 基于陕西省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J]. 城市规划学刊, 2025(4): 64-71.

[2] 陈小卉, 胡剑双. 江苏省乡村空间治理实践: 阶段、路径与模式[J]. 城市规划学刊, 2024(1): 38-45.

[3] 孙莹, 张尚武. 中国乡村规划的治理议题: 内涵辨析、研究评述与展望[J]. 城市规划学刊, 2024(1): 46-53.

[4] 李和平, 赖文韬, 肖文斌, 等. 乡村连片规

划: 实践指向、理论逻辑与路径方法: 基于“功能—网络”视角的解析[J]. 城市规划学刊, 2023(3): 47-55.

[5] 黄亚平, 郑有旭, 谭江迪, 等. 空间生产语境下的村镇聚落体系认知与规划路径[J]. 城市规划学刊, 2022(3): 29-36.

[6] 张翔晨, SHAW D, 赵氏, 等. 尺度重组视角下英国大都市区治理实践及启示: 基于英格兰6个大都市区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24(4): 41-50.

[7] 武丹, 耿虹. 场域理论视角下滇西南乡村空间重构的内在逻辑辨析[J]. 城市规划学刊, 2023(4): 41-49.

[8] BRENNER, N. The limits to scal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scalar structuration[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1, 25(4): 591-614.

[9] 王雨, 张京祥, 王梓懿, 等. “城市—区域”背景下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尺度重构和跨界治理转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4, 39(3): 109-117.

[10] BRENNER N.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 state spaces in western Europe, 1960-2000[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4, 11(3): 447-488.

[11] BRENNER N, KEIL R. *The global cities reade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12] BRENNER N, SCHMID C. The ‘Urban Age’ in Ques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4, 38(3): 731-755.

[13] NEWIG J, LENSCHOW A, CHALLIES E, et al. What is governance in global telecoupling? [J]. *Ecology and Society*, 2019, 24(3): 26.

[14] WOODS M. Engaging the global countryside: globalization, hybridity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rural plac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7, 31(4): 485-507.

[15] 吕祖宜, 林耿. 混杂性: 关于乡村性的再认识[J]. *地理研究*, 2017, 36(10): 1873-1885.

[16] MARSDEN T. Rural futures: the consumption countryside and its regulation[J]. *Sociologia Ruralis*, 1999, 39(4): 501.

[17] WOODS M. Rural geography: blurr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connection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9, 33(6): 849-858.

[18] MORMONT M. Who is rural? or, how to be rural: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he rural [M]//MARSDEN T, LOWE P, WHATMORE S. *Rural restructuring: global pro-*

- cesses and their responses. London, UK, David Fulton Publishers, 1990: 21-44.
- [19] 王丹, 刘祖云. 国外乡村空间研究的进展与启示[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12): 1991-2002.
- [20] 刘云刚, 王丰龙. 尺度的人文地理内涵与尺度政治: 基于1980年代以来英语圈人文地理学的尺度研究[J]. 人文地理, 2011, 26(3): 1-6.
- [21] 李耕.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中的转译与尺度重构: 以浙江省泰明县茶产业为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9(6): 55-65.
- [22] 张衍春, 杨宇, 单卓然, 等. 珠三角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机制研究: 基于产业合作项目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比较[J]. 地理研究, 2020, 39(9): 2095-2108.
- [23] 阎海, 顾萌, 葛大永. 要素流动视角下的苏南地区乡村振兴策略探讨[J]. 规划师, 2018, 34(12): 140-146.
- [24] 洪仁彪, 张忠明, 李树君. 发达国家乡村转型特征与中国特色乡村发展路径探索[J]. 农业工程学报, 2022, 38(15): 359-366.
- [25] 杨洁莹, 张京祥, 张逸群. 市场资本驱动下的乡村空间生产与治理重构: 对婺源县Y村的实证观察[J]. 人文地理, 2020, 35(3): 86-92.
- [26] 韩炜, 赵一夫.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机制与模式研究[J]. 地理科学, 2023, 43(8): 1340-1349.
- [27] 唐伟成, 彭震伟. 半城市化地区的发展特征与演化机制研究: 基于江阴的案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5): 62-68.
- [28] 李伯华, 刘沛林, 窦银娣. 转型期欠发达地区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及微观机制: 以湖北省红安县二程镇为例[J]. 人文地理, 2012, 27(6): 56-61.
- [29] 石忆邵. 乡村地理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 地理学报, 1992, (1): 80-88.
- [30] XIN S, GALLEN T N. Conceptualising 'neo-exogenous development': the active party-state and activated communities in Chinese rural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4, 109: 103306.
- [31] 薛美琴, 马超峰. 在地性整合: 社会组织立体式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J]. 学习与实践, 2023(6): 131-140.
- [32] 任路. 国家化、地方性与乡村治理结构内生性演化[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60(1): 24-33.
- [33] 聂桂博, 艾少伟, 王瑞宁. 基层政府主导下中国乡村地方性的呈现与形成探究: 以河南省郟县姚庄乡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5, 44(2): 359-372.
- [34] SHEN M, SHEN J. Governing the countryside through state-led programmes: a case study of Jiangning district in Nanjing, China[J]. Urban Studies, 2018, 55(7): 1439-1459.
- [35] LI P, RYAN C, CAVE J. Chines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ransition in the case of Qiyunshan, Anhui 2008-2015[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5: 240-260.
- [36] 黄剑波. 乡村社区的国家在场: 以一个西北村庄为例[J]. 西北民族研究, 2005, (1): 187-193.
- [37] WANG Q, ZHANG X.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China's proposed rural land rights reform and four types of local trials[J]. Land Use Policy, 2017, 63: 111-121.
- [38] 周庆智. 地方性规范: 作为乡村扩展秩序的基础[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59(5): 1-11.
- [39] 杨贵庆. 我国传统聚落空间整体性特征及其社会学意义[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 60-68.
- [40] JIANG Y, DUAN J, ZHANG Y. The spontaneous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traditional villag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relationship: a case in Fuling, Fujian, China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5, 157: 103309.
- [41] 王勇, 李广斌. 基于“时空分离”的苏南乡村空间转型及其风险[J]. 国际城市规划, 2012, 27(1): 53-57.
- [42] 乔杰, 洪亮平. 从“关系”到“社会资本”: 论我国乡村规划的理论困境与出路[J]. 城市规划学刊, 2017(4): 81-89.
- [43] 黄田, 饶义军. 从互嵌到共嵌: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的互动关系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24(4): 28-34.
- [44] AMIN A, THRIFT N. Institutional issues for the European regions: from markets and plans to socioeconomics and powers of association[J]. Economy and Society, 1995, 24(1): 41-66.
- [45] 肖璞. 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 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9): 88-104.
- [46] XIN S, DENG H. Beyond entrepreneurship: China's emerging party-statecraf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5, 156: 103277.
- [47] 格兰诺维特. 镶嵌: 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 罗家德,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48] 王斌. 空间变革: 嵌入地域发展的传媒产业集群[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6): 116-119.

修回: 2026-01